

康有為早期遺稿述評

松杉樓閣離煙鳥

主編

黃明同
吳熙釗

啼花放山池晚草平

云長月晏眠

康有為

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主编：黄明同 吴熙钊

作者：黄明同 吴熙钊

徐光仁 何建安

中山 大学 出版 社

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主编 黄明同 吴熙钊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26.6万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册

ISBN 7-306-00113-2

B·14 定价：4.95元



康有为像



流亡海外时的康有为

(摄于美国纽约)

廠電線鐵路之設皆採用新政非

祖
宗之舊法矣

皇上與諸臣審時度勢圖謀自強亦固知
法之不能不變矣徒以根本未變大
制未新少襲皮毛未易骨髓譬猶厦
屋朽壞岌岌將傾而粉飾補漏糊裍

傑士上書彙錄

故宮藏本《杰士上书汇录》

日本變政考卷二

工部主事臣康有為纂

明治二年正月四日，日皇臨便殿，召輔相議定參與各官傳勅書於百官曰：朕惟在昔神皇肇基，列聖相繼，以逮朕躬，朕否德夙夜兢業，懼墜先皇之緒也。曩兇賊梗朝命，億兆苦塗炭，幸賴汝百官將士之力，速奏戡定之功，百姓安堵。今茲歲在己巳，三元啟瑞，上下乂安，遠邇來賀。朕何慶如之！惟天道靡常，一治一亂，內安必有外患。

前 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与洪秀全、严复、孙中山等一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他是中国资产阶级诞生以后最早出现的杰出的政治代表。他一生满怀爱国激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他大声疾呼变法，呼吁社会改革，谋求救亡图强的治国之道，艰难跋涉在“山河已割国圯攘”的历史途程之中。虽然，他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仅仅是昙花一现，失败了；他上下求索，竭思殚虑，构想一个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蓝图，由于不符合历史潮流，也被历史的浪涛所淘汰，并终于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悲剧性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但是康有为的历史功绩，并不在于变法本身的成败得失，而在于他以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的历史眼光和过人的胆识，透过历史的重重苦雾，看到了延续几千年的、被封建统治者神化了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的历史必然，勇敢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石破天惊地提出了用资产阶级民主政制代替封建政制的救国主张。这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它像春雷的巨响，震撼着“万马齐喑”的封建古国，也使“山河尺寸堪伤痛”，“贾生痛哭欲如河”的爱国志士，看到了救国的曙光。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康有为不仅是一位政治维新的领袖，而且是一位学贯中西，杂糅经史，勇敢地向封建传统思想、传统观念、传统文化猛烈开火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启蒙了一个时代人们

积淀的封建思想和意识观念，开拓了一个时代新的思想风尚。同时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思想上沉重的传统的封建文化的积淀，也不完全是属于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近代这个民族灾难的时代的产物。从康有为一生的思想、文化素养和生活情趣，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爱国者的救国热忱，不甘屈辱的中国人的尊严和自信，也体现了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开始觉醒，上下求索而又不能真正掌握历史的巨轮，找到能医治沉疴的“神方大药”的爱国者的彷徨、困惑和固执，甚至不谙世情的迂腐。康有为也正是以他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启迪着后来的革命者，起到一个资产阶级改革的先驱者的积极的启迪作用。

康有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他的思想带有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特点、素质，影响波及东南亚一带。而他十六年的海外流亡，游历了三十二个国家的经历，使他有与各国政治家、思想家和人民群众广交朋友，切磋学问，成为一个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而国外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有考察各国的政制风情，接受西方最新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科技思想等等的熏陶，触发了他思想上的变化，康有为后期经济思想、科技思想、美学思想和人才思想的发展，就表现了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上新的飞跃，带有鲜明的属于世界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时代色彩。

广东是康有为的故乡，广东人民为本省出了康有为这位世界历史名人而感到自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对康有为，广东也像全国一样，未能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研究终于随着政治上的变化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研究康有为思想的论著相继发表，一个重新评价康有为的热潮，在广东，也在全国正方兴未艾。今年，是康有为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也是维新变法九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曾为中国近代

社会的民主和富强作出贡献的人物，华南师范大学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将康有为研究列为重点科研课题，并在南海县的支持下，决定成立康有为论著与研究丛书编委会，负责编辑康有为论著和研究丛书，计划在近几年内陆续出版如下著作：《康有为思想研究》、《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康有为哲学思想研究》、《康南海教育文选》、《康南海诗文选》、《康南海政治文选》、《康南海哲学文选》、《康南海经济、科技文选》和《康有为著述编年目录与研究资料分类索引》等。参加这套丛书编著的包括历史、哲学、教育、文学、经济等学科的同志，我们试图通过学科的横向交叉研究和合作，吸取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康有为的最新成果和新发现的史料，深化对康有为思想的认识，展拓多层次的思想研究，给予康有为一个历史的公允的评价，也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

当康有为论著和研究丛书陆续出版之际，恳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

曾近义

钟贤培

1988年2月

序

由广东康梁研究会组织的“康有为丛书”的一种《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行将问世，主编黄明同副教授和吴熙钊副教授嘱我为它作序。我对有关课题谈不上有什么深入研究，但对这本书的出版感到欣喜，一则本书是康有为早期思想科研成果的精粹，论文四篇都是新课题，不少论点发前人所未发，富有启发性；二则本书选辑了康氏早期著作中最有价值而尚未正式公开出版的若干篇章，它们除了可以为上述研究论文提供较完整的论据以外，本身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名著，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康有为早期论著甚多，其中最能表现康氏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当时的时代精神因而最有价值的，是围绕着以下两个主题的著作。其一是康氏毕生探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众所周知，康氏所著《大同书》，酝酿很早，成书较晚。他在自编年谱中说，在1884年“演大同之义”，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而且在广州万木草堂和桂林讲学时，曾对学生们口述过该书的要义，但原稿秘不示人。现在本书选辑的《实理公法全书》一种，在康氏生前未发表过，可能与《人类公理》的内容有关联，这是研究康氏大同思想的来龙去脉所必须探究的重要文献之一。此书在台湾曾有印行，流传不广，在大陆尚未公开出版，亟须刊布，以利研究。由于上述缘由，对康氏这一著作的研究，在过去极为罕见，本书收入的《从几何定理到“人类公理”的推演——〈实理公法全书〉简论》一文，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

《康子内外篇》成稿于1886年——1887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哲学的开篇之作。其内容虽未直接涉及理想社会的理论问题，但其议论天人之际，不忍之心种种，仍与《大同书》的不忍主旨相互发明，因此是研究康氏大同思想形成与发展所必须探讨的，本书所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变革的开端》一文，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康氏原著的历史背景、学术源流、内容论旨以及历史地位等问题论述详明，评析中肯，对读者很有启发引导的作用。

康氏早期著作另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当是有关变法维新的政治性言论和理论。本书选辑这方面的康氏原著两种，都未在国内公开正式出版过。第一种——《〈日本变政考〉序、按语、跋》是从1980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中摘出的代表康氏本人变法观点的言论。新发现的《日本变政考》确是戊戌年（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留在宫中的正本。多年来史学界误传此书在戊戌政变时已被抄没、销毁或流失，未深入查找，以致让它在原清宫藏书的昭和殿内默默地尘封了几十年。在本书被发现以前，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彰健先生曾把美国人玛丽·芮沃寿（Dr. Mary C. Wright）1947年拍摄的《日本变政考》显微胶卷整理后出版，其内容有无出入，我个人未做校对，不敢肯定。无论如何我们既然已发现它的正本，当然应把它刊布问世，以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引以为憾的，是我们这次付梓的书仍未能把故宫藏本《日本变政考》全文刊出，以应研究康氏思想的急需。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读到这本历史名著的全文版本。

现在收入的研究论文《维新变法的理论纲领——〈日本变政考〉述评》，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康有为导演的百日维新与《日本变政考》一书的关系。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即认为康

氏这本书才真正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对过去不少论者断言康氏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书是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之说，进行了辨析，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有关维新运动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康氏的另一本有关维新运动的政论性著作——《杰士上书汇录》，也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未刊本。多年来，研究戊戌变法，特别是百日维新的重要史料，首推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历史总是扑朔迷离，由百日维新到戊戌政变，转瞬之间，维新运动一败涂地。人们不是没有理由推测，康有为的戊戌奏议，包括正本和底稿，已在政变中被抄没、销毁、散佚。1911年，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经多方搜集，得奏稿二十篇，存目十三篇，以《戊戌奏稿》为书名刊行问世，一时被目为权威史料。近年来，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根据档案资料进行核对审校，认为该书绝大多数文件并非真奏折，而是康氏在政变后的补作或伪作。1973年，他（黄彰健）编辑出版了《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一书，颇受研究者所重视。但在这本书所辑的三十余篇奏议中，康氏本人具奏的仅有五篇，此外都是为别人草拟的，与当时奏议的全貌距离尚远。

1981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载文介绍“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此书共收录了康有为在戊戌年正月到七月的条陈十八件，与已出版的国内外有关版本对照，发现有七件从未在任何出版物上刊载过，弥足珍贵；有五件不仅奏文与过去发表的不同，而且在内容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只有六件与过去发表的相同。十八件条陈都是根据当时康有为的原呈或副本抄录汇编而成的，真实可靠。它保存了康有为戊戌奏议的全貌，既有助于对已发表的有关资料进行考订辨伪，又可以为进一步继续搜寻康氏的其他奏议和论著提供线索。

现在，本书选载《〈杰士上书汇录〉与〈戊戌奏稿〉比较评

析》一文，通过深入细致地比较《汇录》和《奏稿》的异同，分析当时历史的形势和事件的真相，使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观点和变法方针、政策、办法等更加明朗。对于进一步研究康氏世界观中的辨证的主变哲学，了解其爱国激情、救国主张及对待传统儒学和西学的态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依据，论文作者出色的历史研究，体现在对文献的比较评析中。

《〈日本变政考〉序、按语、跋》和《杰士上书汇录》两种珍贵史料的最大价值，在于为研究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确凿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长期以来流行着这么一种观点，认为维新运动在性质上是所谓改良主义运动，这实际上是贬低甚至抹煞这一运动在合乎规律地推动当时中国社会向高一级的形态即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展方面所起的进步作用。我个人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以而且值得加以讨论的学术问题。学术的研究和讨论贵在各抒所见，如果把一家之言封为“正统”、“定论”，而把种种不同的学术见解视为“异端”，那就只能堵塞通向真理的道路。毫无疑问，我们在学术讨论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在此前提下也必须掌握充分的、经过鉴别证明是真实可靠的资料，这样，在研究中所做出的理论论证才能接近真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相信，本书的出版肯定能起到促进维新运动史研究的积极作用，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丁宝兰

1987年8月于康乐园

自序

南海康有为（1858—1927年），是19世纪末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为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他勇于向西方寻求真理，不顾个人安危，发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试图效法日本，把中国引向君主立宪的道路，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独立富强之路。这是康有为政治生涯中最光彩的一章，其先进思想虽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但其开一代新风的历史功绩及爱国主义思想，不应抹煞。

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康有为仍未得到公允的评价，其早期的先进思想也未得到充分的肯定。研究者往往只看到他采用经学方法论政的一面，而未能看到他吸取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并采用实证方法研究问题的一面；只看到他利用儒家经典“托古改制”的一面，而未能看到他学习西方、借鉴日本“仿洋改制”的一面；只看到他自上而下“虚君变法”的一面，而未能看到他要求“全变”、“大变”、“骤变”，从根本上改革封建制度的一面；只看到他软弱无力的一面，而未能看到他对政治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等等。所以如此，固然与多年来“左”的思潮影响分不开，同时与康有为的一些论著尚未公诸于众，研究者所把握的材料有限也不无关系。

进一步研究康有为的思想，特别是深入总结其爱国、改革、开放三位一体的先进思想，不仅是史学研究的需要，而且是当前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为此，我们着重研究了康有为早期的著

作，特别是若干在祖国大陆尚未刊行，或仅在一些刊物上刊出而并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论著，希冀从中准确把握康氏早期的先进思想。在这些著作中，我们感到如下几部特别有价值：

《康子内外篇》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称：“光绪十二年（丙戌）二十九岁。……是岁作《内外康子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又称：“光绪十三年（丁亥）三十岁……作《内外篇》，兼涉西学。”该书包括哲学短文十五篇，不足二万字，但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有许多见解发前人之未发，是康有为从批判宋明理学中走向近代哲学的开始。书中涉及宇宙生成、阴阳消息、自然人性、理气关系、地势决定等方面的内容，呈现出康有为早期哲学的雏形。

《实理公法全书》 该书于《万木草堂丛书目录》中未见。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光绪十一年（乙酉），二十八岁。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光绪十二年（丙戌），二十九岁，……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此虽未言及《实理公法全书》，但康有为学习、研究西方数学，并运用几何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当在这一时期，因此可推见，该书亦为康氏的早期著作。思维方式的更新与观念的更新，往往是同步的，该书既反映康有为观念的更新，又体现他从传统的思维方法向逻辑演绎方法的转变。康有为在书中，大胆地运用西方“实理”方法分析中国社会问题，试图以“实理”、“实测”之法，代替中国传统的“虚理”、“虚测”之法；以“人类平等这一几何公理”及西方民约论，来推演君臣、父子、夫妇、师弟、朋友彼此之间应该平等的准则。他宣扬人权自主、人性平等，否定三纲，要求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无疑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日本变政考》 该书十二卷本卷首自注：“是书经于十二月恭进，顷奉旨宣取。原本所译日文太奥，顷加润色，令文从

字顺，并附表注，以便阅看。”由此看来，该书编撰于百日维新前夕，后又经增修，曾两次进呈（此事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亦有记载）。该书是研究康有为早期思想的重要材料，可以说，它是康有为当年劝诫光绪皇帝采鉴日本维新变法的一本教科书，书中总结日本学习西方进行维新变法而由弱致强的历史经验，表明了要求变法的强烈愿望。康有为在书中还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和一系列的策略措施。他反复论证三权鼎立是维新变之本，但又指出鉴于中国“民智未开”，保守势力过大，改革的第一步应是开制度局于宫中，“分别官差”，改革官制，任用富有改革精神的“俊伟之士”，避免“任旧人以行新政”。书中强调变法应从根本上变，表明了维新变法与洋务变法的分界所在。

《杰士上书汇录》全书共三册，汇集康有为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至七月间的条陈18件，是研究康有为变法思想和戊戌变法史的珍贵资料。该书的发现，证实台湾学者黄彰健关于康有为《戊戌奏稿》中大部分奏折并非真折的结论是正确的。据史学界研究，《杰士上书汇录》其中七件从未在以前的版物上刊载过，六件与过去发表的相同，五件与过去发表者不同。不过，该书在文字、内容上虽与过去刊行的《戊戌奏稿》有异，但基本思想是相一致的，异点表现为对一些问题阐述的尖锐、透彻程度，如关于国家危亡局势的分析，关于“大变”、“全变”、“急变”思想的申述，以及开制度局、别官差以改官制方案的提议等等，“汇录”都比“奏稿”来得更深刻、具体。

康氏的《康子内外篇》等四篇论著所以重要，在于它们集中代表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哲学纲领和新的改革理论；在于它们启迪人们改变长期以来把康氏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纲领的传统看法，而重视康氏融汇中西文化、开拓新的视野，树立新的里程碑的划时代贡